



钟敬文、康丽师生俩

“书童”的追忆

钟敬文先生辞世十年祭

■ 文/图 康 丽

又到水仙花开之时，每每凝视着水仙的娉婷花姿，就会想起钟敬文先生多年的谆谆教导，就会庆幸自己能得入师门，以学生与助手的身份在钟先生人生最后的五年时光追随于他。至今犹能清晰地记得首次拜望先生的每个点滴细节：在先生家门前静候开门时的忐忑，初次见到先生书房中书籍堆积如山时的震撼，面对先生亲切问询时的紧张，以及心绪慢慢平复后惊讶于大师平和待人的感动……而这一晃却已是十五年的岁月流逝了。

今年是钟敬文先生辞世的第十个年头。现在想来，自己当时的阅历还是太浅了！在师

从先生的五年时光中，我竟然从未将岁月的逝去与我敬爱的师长联系到一起。因为他矍铄的精神与投入的工作态度，总会让我时不时地忘记他的实际年龄。甚至，在先生因病入院治疗的那段时间里，我也从没意识到死神脚步的临近。而直到，我亲眼看着先生的胸膛因为呼吸机的撤除而渐渐停息起伏时，我才记起他的百岁高龄，才正视先生的驾鹤远去，才知道原来这世上真有无法形容出来的痛彻心扉。

十年间多次提笔，想要将对先生的追思宣诸于文字，但最后的结果总是搁笔叹息，不知应当从何处开始捋平纷乱的思绪，归整记忆中



的诸多画面，才能将这位备受后学景仰的“人民学者”描绘一二，以追念这份我会铭记终生的师恩。望着案前点缀在翠绿丛中的点点幽香，不由得想起多年前钟敬文先生送我的第一株水仙。也好，不妨就从水仙说起吧！

那时还年少，刚开始攻读我的硕士学位，为了要尽快熟悉协助钟先生的相关事务，我课余之外的时间大都泡在了先生的书房里。我刚入师门，学养尚浅，所以钟先生除了交代功课与工作外，同我谈起的多是为人的品格与为学的风骨。恰值水仙花期，从先生那里偶得了一株水仙的鳞茎球，因为事忙便随手放在了宿舍的角落。一周后想起再看时，表皮已经皱起。原想着这花大概是不会再有起色了，但又惟恐糟蹋了先生的一番美意，还是尝试着将鳞茎球泡在了水里。坦白讲，在那之前，水仙于我不过是植物的一种而已，但当我看着绿色的茎叶从干皱的球茎中缓缓抽离，慢慢长高，及至绽放花朵时，心中却为它藏于脆弱中的坚韧而感到讶异。不知为何，望着那株因我的疏忽而渐失水分的球茎，又因偶然的坚持与尝试而由无望变为清香满室的水仙，我耳畔响起的却是先生常告诫我的那句话——“一个学者重要的不仅是学问的内容和科学性，更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风骨，要坐得住冷板凳。”只有知悉钟先生人生征程的人才会明白，这是他

走过了漫长的学术历程与人生经历后的体悟。因为有着这样持之以恒的执着信念，他才能直面学问人生中所遭遇的各种挫折冲击，才会将对民俗学、民间文艺学的探究与建设溶进了自己的骨血，才会在古稀之年仍掷地有声地说：“为了恢复和发展我们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、文化（民俗学、民间文艺学），虽然我年龄已过古稀，但只要一息尚存，就要为这种神圣的事业而鞠躬尽瘁。”[钟敬文：《履迹心痕·自序》，《学人游记丛书·履迹心痕》，第5-6页，钟敬文著，中国旅游出版社，2000年1月。]钟先生重风骨，其行事亦显风骨。当亲见水仙自干涸中绽放新绿时，它在我的意识中，便超脱了植物本体成为“风骨”的代言。于是，我也学着先生一样，有了冬季养水仙的习惯，即便在失了先生馈赠的这十年间依然如故。

在师从钟先生的五年里，除了课业之外，我还时常以助手的身分陪同先生出席各种会议，或协助他处理一些文字工作。我抱着资料跑前跑后的样子，常常被他戏称为“书童”。他曾经问过我，身兼两职是否觉得辛苦？以我当时的心情论，能被允许有更多的时间跟随在钟先生身边问学讨教，已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了，高兴还来不及，哪会觉得辛苦？更何况，凡是得到先生肯定的时候，必会

有一、两本书籍作为奖励。

说起赠书，这是先生颇为知名的惯习之一。而接受馈赠最多的，便是门下的学生。虽然先生一生笔耕不辍、著述丰富，但他在各种场合中多次强调过，他觉得每个学生才是他最堪重用的成果，也是学科得以发展的根基。因此，除了课业上的教导外，钟先生总会想方设法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阅读资源。他运用自己在学界的影响，汇集国内外大量书刊，筹建了国内学界首屈一指的民俗学资料室。他怜惜学生的清贫，但凡有新的著作出版，总是要自订百八十本回来，除了学界同仁外，门下研修的学生们才是这些书籍最大的归处。除此以外，他在自己研读国内外文献时，只要碰到与学生研究论题相关的资料，也都会保存下来，再分别转赠。作为书童的我，当时最常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将这些资料复印、归档。我知道，这只是先生授业育人时的小习惯。但我想先生不知道的是，曾经受惠的学生心中的感恩，乃至现在钟门弟子中仍有不少人师者仍保留着这样的传统。

钟先生晚年惯有避暑之行。每年暑期七、八月间，他往往都会趁着学校放假，到京郊休养。作为书童，我也有幸陪同过几次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记忆之中，多是先生在疗养院客房内伏案疾书或是持卷阅读的身影。所以，那段时光

与其说是避暑休养，倒不如说更像是在宁静之所的闭关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休养的目的是为了“逃避城里的炎热和客人的‘洪水’”，还有就是“待还的文债或想看的书”[钟敬文：《西下庄通信》，《学人游记丛书·履迹心痕》，第216页，钟敬文著，中国旅游出版社，2000年1月。]

说起看书，倒是有件趣事。钟先生随身带的书籍自然会因为兴趣的转换而有所变化，但是无论怎样更迭，其中有一本是历来不变的。如果我在这里打个哑谜，恐怕很少有人能猜出一二。这本书既非精深的专业著述，也非陶冶性情的诗赋文学，而是一本字典，一本普通的新华字典。我曾多次在先生书房的书桌上看到过它，但它从未引起过我的注意。研习学问的人手头有上一、两本字典，原本也不是多稀奇的事情。但一本普通字典却出入随身，就让我好奇不已了。我还记得先生当时给我的回答：“做学问嘛，总会遇见没法确定的文字，查查清楚总是好的。字义明确了，也好把握表达的尺度。”很平实的回答在当时却让我的心绪起伏动荡了许久。未入师门前，我便知晓钟先生的才名。他的散文曾得到郁达夫先生“清朗绝俗，可以继周作人、冰心之后武”的评价。我原以为，这了得的文字功夫是文思与灵感的一气呵成。到那时，才知道所有的文采都是生成在逐字必究的严谨基础之上的。散文的创作如斯，学术文章更是这样。难怪先生每每敲打我要注意掌握好论文中的“分寸”。原来，这其中既要有思索探究上的深邃到位，也要有文字上的严谨把控。故而，自那时起，我便把家中的字典从书柜的角落移到了最醒目的位置，不时翻阅。

歇下笔来，细细一数，才惊觉，原来生活中许多习以为常的行为竟然都是可以找到仿行出处的。知识与学问固然是我从师五年的收获，这些从钟先生那里承继而来的行为习惯，又何尝不是恩师教诲的体现呢？师恩难忘，这已经印刻在生活点滴处的师恩又怎么可能被忘却呢？

追思与纪念的方式是因人而异的。于我而言，“纪念”二字或许应当这样理解：“纪”字有己，“念”字随心，由己及心，由心践行。我想，如能够做到行坦途之上淡然，处逆境之间坚守，能够驻守学问一途，将先生心之所想，践行于自己的教研工作，那么，才算是不辜负钟先生的教导，也才算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了。■

壬辰龙年正月于北京西山

钟老的 功德之 爱

文
图
刘
志
文

广受学人尊崇和敬爱的我国民俗学之父——钟敬文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了。今年又是钟老先生诞辰110周年，为了纪念这位被国内外学者誉为“中国民俗之父”的民俗学泰斗，在京的民俗学界近来举办各种活动纪念钟敬文先生。本刊本期也特别开辟了一个栏目以之纪念。这些文章均为钟老的学生所写，情深意切，就以这些文章为代表，敬慰在天堂上的钟老先生吧。

我虽不是钟老的门生，但他对我却一直多年的关爱，让我永志难忘。每当我在民俗学、民间文学工作中做出一点小小成绩之时，他就会十分欣慰，并表扬和鼓励我，还指出我今后如何再努力，犹如一位慈父在关爱着我。

记得上个世纪，大概是1989年（或1990年），他老人家不顾已耄耋之年，风尘仆仆地来到广州进行学术调研考察，百忙中还特别约我去与他见面。见面时，他与往常一样，先是慈祥地问我，最近写了什么？有没有著作出来？我说正在收集资料，准备出一部民俗志书——《广东民俗大观》，并已与出版部门谈好出版的各项事宜。他老人家听后异常地高兴，连声说，“好，好，好，这是当前我国第一部民俗志书，很重要，很需要广东带个头，让全国各地都来编一部各自地方的民俗志书，把我们民间传统文化记录和保存下来，否则再过若干年这些东西就找不着了。你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功德无量！”

当《广东民俗大观》临近付梓之际，1993年，应我的请求，他老人家二话没说，专门为《广东民俗大观》题写了两首诗和一篇有数百言之多的题辞。两首诗是：

美雨欧风急转轮
更弦改辙为图存
一言山重需铭记
民族菁华是国魂

祝广东民俗大观面世
钟敬文

人文与世共推移
汹涌时潮撼故堤
糟粕精华需细别
当心莫作败家儿

祝广东民俗大观面世
钟敬文 时年九一